

从实用性修理到原貌修复 ——辽宁义县奉国寺千年遗产保护实践评析

洗宁¹,申唯真²

(1.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8;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对辽宁义县奉国寺从辽开泰九年(916)至1989年间的维修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1984—1989年间的大修为研究重点,从古代的实用性修理到20世纪80年代的原貌修复,对奉国寺历次大修的理念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阐释,结合当前的历史建筑保护思想,对未来的遗产保护与修复方式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建成遗产;原貌修复;现状保存;奉国寺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志码:**A

一、奉国寺现状概述

辽宁义县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是由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在母亲萧太后(萧绰)故里所建的皇家寺院。其基址在宜州(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的东北部,南邻义县的主要街道奉国寺路,东、西、北三面临窄巷,被民居环绕。其现状总平面前窄后宽,沿中轴线从南至北依次为外山门三间、内山门一间、木牌坊三间、无量殿五间,殿后有甬路通向月台,其后高耸的台基之上矗立着面阔九间的大雄宝殿。

自辽代以来,奉国寺历经辽金战争、金元战争、明清多次大地震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建筑几经损毁与重建。辽、金、元时期曾有高耸的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后法堂九间、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但据推测,其在明代逐渐倒塌殆尽^[1]。现除了大雄宝殿主体为辽代遗存、外山门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外,其余配殿、牌坊皆是清代建筑,其建筑

的尺度、规模皆不如辽代。

奉国寺大雄宝殿内供奉过去七佛塑像,殿内现存有元、明两代壁画共534.2 m²。共包括元代东西两壁佛像十幅、北壁菩萨像八幅、南壁十一面观音像两幅与揭取保存的明代十八幅罗汉像^[2]。梁架下部、室内斗拱还存有辽代彩画,包括十二躯飞天、大量的以缠枝花和卷草纹组成的凤纹、各式网目纹等^[3],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二、历代修复实录与古代保护意识

1. 历代修复实录

奉国寺内现存石碑十四通,记载了其扩建、续建、大修的原因,主事者,修复的过程与影响。除了元明之际有两百余年的断层外,奉国寺几乎每隔七八十年就会进行一次大修。其中记载较为详实的8次大修的主事者与修复成果如表1所示。

表 1 始建、续建、部分重要修复年表

时间	建设/修复成果	主事者
辽开泰九年 (1020 年)	在宜州东北部建成熙寺,后改称奉国寺	处士焦希赞
辽乾统七年 (1107 年)	以佛堂前两庑为洞,塑一百二十贤圣,饰以重彩,加以涂金,而四十二尊未毕	僧曰特进守太傅 通敏清慧大师捷公
金明昌三年 (1192 年)正月	完成四十二尊雕像,寺内“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煌”	寺主义擢
元大德七年 (1303 年)	危者持之,颠者扶之,缺者补之,漏者覆之,朽椽之功必精,赭堊之饰必良	普颜可里美思公主 驸马宁昌郡王
元至正十五年 (1355 年)	对于大奉国寺建筑群的完整记录: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东斋堂七间、东僧房十间、正方丈三间、正厨房五间、南厨房四间、小厨房两间、井一眼,东至巷,南至街,西至巷,北至巷	住持宗主大师宗淳
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	旧像率皆五色装严,佛像泥饬,岁久脱落殆甚,以泥金图画佛像,灿然改观。背后北门,风凌雨震,乃设倒座观音,龕刹穹窿,构结严密,寝风阻雨。法像前设木栅,禁人作践	河南通许教谕郡人 梁延登、武举史有裕、 义人徐大化
清乾隆五年 (1740 年)前后	竖立牌坊三间,创大悲殿五间,韦驮殿一间,龙王土地配殿二间、二门三门周围群墙	城守尉刘公
清嘉庆十六年 (1811 年)	圣贤相庑廊已改为东西两宫及毗卢庵。临大街山门三间,院极宽阔,正殿前为万寿殿三楹,牌坊一座,于正殿及牌坊外增修正门一间,钟亭一座,联筑石墙环护	城守尉福公

2. 古代的保护意识

(1) 来自民间的保护主体

奉国寺历代的改建、复建、扩建,并不是一种官方行为,而是多由寺庙住持或笃信佛教的施主发起,百姓也积极参与募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时是由公主、驸马出资修复,但他们是以信徒的身份出面,而非代表官府的意志。这些修复一方面出于一种朴素的时空之叹,正如《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并序》所说的“嗟百年营缮之劳,忍一旦残毁之易”;另一方面出于僧人和信众的虔诚之心,奉国寺经受战火地震却依旧不倒,佛像依旧庄严慈悲,似有佛法冥冥中相护,僧人们将残损的寺庙修复到完美如初,可以借以宣扬佛法,教化信众。

官府对于寺庙的保护多数情况下采取置身事外的中立态度,不积极主导,但若寺庙修成需要撰写碑记,也乐于接受委托。这是因为中国文人有尚古的传统,但由于深受儒家以民为本、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影响,撰写《重修义州奉国禅寺碑记》的官员在碑文中

写道,所谓使人脱离苦海、登大觉之彼岸是僧人所追求之事业,自己承“仲尼之道”,不相为谋,只是因为僧人们“严守僧规,又能修饬增拓其殿宇,以祝上禊民社为第一事,其心有可取者”,才愿意作文记述。

由于古代没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准则,官吏有时还会无意识地破坏古迹:因为征收的岁饷无处存放,都堆放在寺庙内,米豆的潮气滋生苔藓,损坏古老的墙体结构,鼠雀蝙蝠的污浊还会腐蚀木制门窗框和壁画。官员们还提出,只有当与民休息,使人有余力、家有余财时,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修复寺庙,所谓“先成民而后致力於神”。这样的思想体现了古代官府与宗教体系的相处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盛极一时的宗教建筑,最后只有规模大、施主和信徒众多的寺庙才能募集足够资金受到保护。

(2) 基于维持实用功能的保护目的

在传统社会中虽然有朴素的遗产保护意识,但维持建筑当下的实用功能比进行历史样貌考据更重要。对于信徒而言,寺庙本身

是弘扬佛法之地,是虔诚的信徒祝祷祈愿之所,需要满足各种宗教仪式的功能需求。官府则看重的是佛寺宣扬善恶有报、因果轮回对当世的习俗教化功能,故而清朝官员增修了原本不属于佛教建筑的牌坊,牌坊前的广场是祝寿、山呼万岁、宣讲圣谕之地,寺庙与当朝的公共政治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在近现代修复理论形成之前,中国古代没有提出一套相应的保护理论与准则,也没有对建筑史的系统考据。虽然碑文中屡次提到“复其原貌”,但往往并不会严谨地按照损坏之前的样子进行修复。经济水平、流行风格、审美偏好、统治者意志都会对修复的成果产生影响。例如:元代的壁画残损后,被补以明代流行的云纹。七尊大佛雕塑“旧像率皆五色装严,佛像泥伤,岁久脱落殆甚”,在明末被重塑了金身,但佛像五官略有更改,与两旁的辽代胁侍菩萨雕塑风格有所差别(见图1、图2)。大雄宝殿鸱吻和雕花屋脊则更新成了清代样式。



图1 七佛像



图2 胁侍菩萨像

三、原貌恢复与现状保存的理论探索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对古建筑的全面研究和保护理念探索始于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虽然未能对奉国寺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从梁思成先生1932年《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等文章中已经可以窥见当时的保护思想:保持现状是第一要务,恢复原貌是终极追求。

保持现状,首先要替换糟朽的屋面瓦椽,避免雨水进一步对殿内造成腐蚀破坏,这可以对应为今天所说的续命式的保护性修复。其次是对缺失残损部分的修补,这里可能涉及艺术性修复的各方面问题,如真实性、可识别性等,但当时的论述尚未形成体系,且从南禅寺等同时期古建筑的修复来看,替换材料有意做旧,使观者难以察觉,虽保持了视觉上的完整性,但忽视了可识别性^[4]。第三是对有失原状者之复原。但梁先生也承认复原问题复杂,“必须主其事者对于原物形制有绝对依据,方可施行;否则仍非原形,不如保存现有部分,以志建筑所受每时代影响之为愈”^[5]。

恢复原貌的思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筑修复领域的地位十分重要,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了“在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维修工程中,遵守恢复原状或保存现状的原则”,20世纪70年代,南禅寺大殿也尝试进行了整体恢复原貌的保护实践,在整个过程中都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这些单位以及专设的博物馆等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此后,国内保护界越来越认识到恢复原貌这一方式面临的种种问题,甚至对改建、重建是否还属于修复展开了讨论,对重要建成遗产进行现状保存现已基本达成共识。

四、1984—1989 年的保护实践

1. 大修 的提出与指导思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奉国寺数次得到国家拨款维修,并于 70 年代成立了奉国寺文物保管所,负责日常维护管理。80 年代,发现大殿诸多安全隐患,经国家文物局勘察确认,予以拨款修缮,在 1984—1989 年完成了 12 项修缮项目。修缮方案“对影响整体风格的部分加以改正,但对不影响整体风格的旧有不正确做法仍加以保留”^[6],尝试复原辽代建寺之初的寺庙格局和建筑立面,以起到研究和教育展示的作用。

2. 总平面关系的恢复及山门的重建

修复前,奉国寺仅存清代山门(俗称“内山门”)、牌坊、无量殿、大雄宝殿等中轴线上的一系列建筑及钟亭等小型构筑物(见图 3)。由于寺庙荒废已久,外山门坍塌,寺庙东西两侧遗址范围被当地民居侵占,形成前窄后宽的总平面格局,遗产地的领域感不强,周边环境也较为杂乱(见图 4)。按照元代碑记的记载,有“山门五间”,所指的应该是内山门以南的另一座建造时间在辽开泰九年到乾统七年之间的山门,但它早在明代就已坍塌,其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内山门南中轴线 48 m 处^[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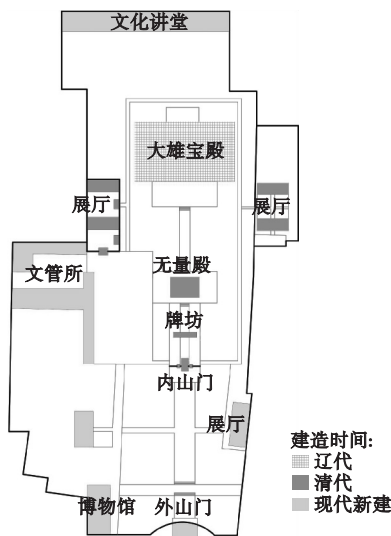


图 3 奉国寺总平面示意图



图 4 20 世纪 50 年代奉国寺及周边环境

修复工程首先对周边建筑环境进行了清理,动迁民居,拆除了 70 年代在大雄宝殿西檐下建的文管所办公室 11 间,新筑围墙 750 m,扩展寺院面积 16 350 m²,并在距离清代山门以南 90 m 处修筑了仿古外山门(见图 5)。一系列举措中,清理有损寺庙整体价值的现代添建建筑属于释放性修复^[8],是正确之举;以残存围墙的数据为依据补全围墙也值得肯定,因为它隔离了周边民居的火源,保障了遗产的安全;但外山门的重建,以今日的观点,存在令人质疑的真实性问题。



图 5 新建外山门

重建外山门丰富了奉国寺的观赏、游憩空间,提升了建筑群整体价值。但历史上的外山门为辽代所建,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建的仿古外山门却参照了清代形制,既不符合辽代的风格与位置,又并非真实的清代遗存,其修建的必要性存疑;同时,外山门的重建,设计施工精良,新旧难辨,且没有明确标识,有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与可识别性原则。

3. 大雄宝殿的结构修复

20 世纪 80 年代,大雄宝殿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如柱根糟朽下沉,斗拱外倾,后尾脱榫,梁架走闪,椽望板糟朽严重,屋顶瓦碎裂,局部渗漏严重等。渗漏不仅会腐蚀结构构

件,造成坍塌隐患,还会对梁底、斗拱内壁的辽代彩画、殿内壁画和塑像造成侵害。因此,本次工程采取保护性修复,更换了全部2 000根椽子和80%的瓦片,外檐铺作层落架检修,作损朽构件的检修与复制替换,内檐铺作层构件损坏较少,作原位修补、个别下架修配或抽换,并拨正梁架及墩接檐柱。虽然屋顶更换的面积过大,但考虑到大殿已有200余年未经大修,渗漏严重,且梁架彩绘、殿内壁画、雕塑价值极高,不能经受更多损失,因此,对于屋顶这一最易损坏且一经损坏后果严重的部分,采取大面积的修复也是正确之举。

4. 立面的复原改建

大雄宝殿修复前,除前后檐当心间、前檐左右第三间辟门及前檐左右次间、梢间设高窗外,其余各檐柱之间都筑以厚墙。门是六抹橦扇,橦心装斜方格椴条,裙版无雕饰,是清代样式(见图6)。此次修复工程中,南立面拆除了除尽间外的全部明清砖裙土墙和门窗,按辽代“一马三箭”风格重新制作安装门窗隔扇(见图7),为此还揭取了南面坎墙上的明代十八罗汉壁画。东、西、北三面的墙体也因壁画保护之故进行了全面替换。屋脊之上的鸱吻原本是清式,也被拆下放置于展厅中,代之以推测出的辽代鸱吻样式。

“原貌恢复”的出发点是告诉人们真正的辽代建筑是什么样式,希望起到展示与教育作用。但明清的坎墙立面本身不仅没有结构危险,而且已经具备了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无论是从最小干预原则还是从真实性原则的角度出发,都无需对其主动进行拆除替换。拆去清朝的真品,换成现代的仿制品,并



图6 立面原状



图7 立面现状

没有恢复辽代真实的立面,反而会造成清代历史价值的流失。

5. 壁画的保护

大雄宝殿现存罗汉像绘制于明代,壁画病害面积小,病害破坏程度低,总体保存状况较好,现已揭取保存于殿内北侧。其余皆为元代所绘,壁画病害面积较大,部分病害破坏程度高,甚至影响到壁画整体稳定性,总体保存状况较差(见图8)。



图8 元代壁画现状

1984—1989年的修复,对于明代壁画采用揭取、异地保存的方法,对于元代壁画采取了更换支撑体、制作人工地仗就地加固的方法进行保护处理。“先向(元代)壁画的表层注射进化学药剂,进行加固,然后将东、西、北墙的外墙体依次剥去,一段一段砌上砖墙,压上玻璃丝袋,再将玻璃丝袋用化学物质粘固在10公分壁画薄墙的背面,最后,在外面再抹上灰墙。”^[9]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极成功且具有创新性”,但今天看来,由于环氧树脂粘接强度过大、透气性不佳,且与传统材料兼容性差,导致了支撑体与地仗层之间结合力逐渐降低,形成新的空鼓等病害(见图9)。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对于环氧树脂这



图9 明代壁画现状

一新材料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导致了30年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且没有考虑到可逆性的问题,给现在的病害处理带来了困难。

明代壁画集中在南侧坎墙上,由于拆除墙体改装橛扇,不得不将壁画进行揭取,用木框承托,保存在大殿北侧。可见,改建立面的做法还带来了其他连锁反应。异地保护本身较为困难,不到危及遗产安全的状况一般不提倡使用,因为保护过程的不当很容易造成壁画的损失。在揭取前,要将白纸、纱布与壁画用桃胶进行粘接加固,“由于二者表面结合过于紧密,故十八幅揭取之后的壁画表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残余的白宣纸,造成了局部位原有信息缺失”,“临时加固剂没有完全去除造成了表面的挂流和泛白”^[10],使得壁画表面模糊不清。

五、未来的保护与修复方式

20世纪80年代的遗产保护实践折射出今昔对于“真实性”定义的差别,在当时的观念中,“真实性”是第一历史的真实,即在辽代遗产建立之初的真正原貌,凡所后代修复改建有违辽代特征者,皆会削弱建筑的历史价值。因此,推测出建筑的原貌并通过保护实践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是当时的最高追求。而30多年后的今天,国际上普遍的观点则认为,历时性的物质存在累积起来,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清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即便不是原貌的,至少具有清代的真实性,体现清代的处理方式,也自有其研究价值。因此,在当代的保护实践中,对于遗产的最小干预,就是对历史价值的最大保护。

1. 预防性保护

保护界目前一致认为对遗产本体应坚持

最小干预原则,因为任何干预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遗产信息的损失及对材料本身的破坏,因此,保护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性保护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之后可能产生的破坏及随之而来的干预实践,对于遗产的价值延续有着重要意义。应完善保护管理法规,明确保护范围,落实各保护主体的责任;还应该建立监测巡查机制,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与木构建筑消防隐患,合理限定参观人流量,建立防护预案。

提高社会各界的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也是预防性保护的最佳手段之一。遗产保护需要建立起遗产与认知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保护专家-爱好者-知情者”这一范围逐渐扩大的认知群体网络,激发参观或了解奉国寺的人们的自觉保护意识,实现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义县奉国寺数字网络正在搭建,通过图文视频介绍与全景地图,达到了良好的公共宣传科普效果。网站后续还可以加大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力度,包括对于辽宋木构建筑制度的研究和数字复原等,增强专业性、交互性、体验性。

2. 保存与修复的权衡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要满足一座普通寺庙的使用功能,还要实现历史展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教化功能。

奉国寺大雄宝殿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对游客完全开放参观的早期木构建筑之一,当游人环绕大殿行走观赏时,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历史的厚重,这样的时空体验难以用虚拟数字资源替代。但是,彩绘与壁画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及景区的较大客流量下,难免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破坏,甚至褪色直至消失。因此,既能开放参观,又能较长久地保存彩画是最大的期待。

如果大雄宝殿未来继续对游客开放,那么是否要对梁架彩绘、壁画与雕像彩绘进行适当的加固与补绘?采用何种材料与工艺保证色彩复原的真实?如何与原有的颜料层进行区分,保证可识别性?这些仍是学界今后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六、结 语

一千年来,义县奉国寺屡屡损毁又几经修缮,是中国唯一拥有完整格局遗存的古代佛教寺院,而大雄宝殿屹立千年,彩绘壁画精美如初,是辽代建筑艺术水平的宝贵见证。即便囿于时代思想的限制,过去曾有一些不当的修复措施,但也为当代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古代的碑文详细记载了修复内容,使得修复过程有据可循;20 世纪 80 年代的考古、测绘、释放性修复、保护性修复、异地保存等举措,都对遗产保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于这座辽代建筑实例而言,在今后的保护实践中,仍需以真实性和最小干预为指导原则,最大限度地保存前人留下的信息,同时,建立预防机制与宣传交流平台,让社会各界了解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由衷热爱、自觉保护,使遗产的生命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1] 赵兵兵,王剑. 辽代奉国寺中院布局探析[J].

辽金历史与考古,2011(00):436-458.
[2] 李倩. 奉国寺元代壁画裂隙病害成因分析[D]. 西安:西北大学,2019.
[3] 白鑫.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建筑彩画纹饰研究[J]. 美术大观,2019(8):150-152.
[4] 高天. 南禅寺大殿修缮与新中国初期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的发展[J]. 古建园林技术,2011(2):15-19.
[5] 梁思成.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0.
[6]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 义县奉国寺[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7] 赵兵兵,王剑,刘思铎. 义县奉国寺山门复原初探[J]. 华中建筑,2015,33(5):161-165.
[8] 陆地. 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9] 义县地方志办公室. 义县年鉴(1986—1995)[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10] 周鹏程. 辽宁义县奉国寺壁画保存状态勘察与制作工艺分析[D]. 西安:西北大学,2016.

From Practicability Repair to the Restoration of Original Appearance: Analysis on the Preservation Practice of the Millennium Heritage, Fengguo Temple in Yixian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XIAN Ning¹, SHEN Weizhen²

(1.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00168, China;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of Fengguo temple from Ninth year of Kaitai in Liao Dynasty to 1989, focusing on the restoration practice from 1984 to 1989. From the practicability repair in ancient times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in the 1980s, this paper expounds restoration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vious major repairs in Fengguo Temple, and probes into the future way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historical building protection thoughts.

Key words: the built heritage; restoration of original appearance; conservation of present situation; Fengguo Temple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